

社会学与政治学视域下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演变研究

孔欣瑶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2日

摘要

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演变并非线性阶段更替, 而是多重社会力量与制度力量持续互构的动态过程。本文构建“课程社会学与课程政治学”双重视域分析框架, 系统阐释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演变机制。在课程社会学层面, 运用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学科场域竞争理论和微观主体博弈理论, 分别解析市场筛选、学校资源博弈及课堂师生互动对课程价值的自下而上的塑造作用; 在课程政治学层面, 借助课程政策的价值协调、价值安全规约与国家战略赋能理论, 阐明制度框架对多元价值的自上而下的协调、引导与扩容机制。研究发现, 外语教育课程价值的演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博弈与自上而下的制度调控双向互构的结果, 多重价值在共存中此消彼长、动态平衡, 呈现“旧价值存续、新价值叠加”的增量式扩容特征, 其流变方向取决于社会场域与制度场域力量的实时对比与相互校准。本文据此主张, 课程改革应立足双理论融合视角, 在制度规约与社会调适之间构建弹性多元、动态平衡的课程价值体系, 以实现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与个体发展之间的有效协调。

关键词

课程社会学, 课程政治学, 课程价值取向, 外语教育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s

Xinyao Ko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September 3, 2026; accepted: October 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2, 2026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urses is not a linear stage replacement, but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tinuous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multiple social forces and institutional forc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al-perspec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urriculum sociology and curriculum politics”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value orient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urses. At the level of curriculum sociology, it utilizes the theories of cultural capital reproduction, discipline field competition, and micro-subject game theory to analyze the bottom-up shaping effects of market selection, school resource competition, and classroom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on curriculum value. At the level of curriculum politics, it employs the theories of value coordination, value security regulation, and national strategic empowerment in curriculum policy to clarify the top-down coordination, guidance, and expansion mechanism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multiple valu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valu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urses is a result of bidirectional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bottom-up social structural game and top-down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Multiple values co-exist in a dynamic equilibrium, showing an incremental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persistence of old values and the superposition of new values”. The direction of its evolution depends on the real-time comparison and mutual calibration of the forces i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ield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dvocates that curriculum reform should be based on a dual-theory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constructing a flexible, diverse, and dynamically balanced curriculum value system between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national strategy, social need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urriculum Sociology, Curriculum Politics, Curriculum Value Orient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新文科建设全面深化、课程思政体系全面落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纵深推进，外语课程已然突破单纯培养学生语言技能训练的工具性课程定位，成为承载国家文化对外叙事、培育合格的跨文化交际人才、能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通识课程。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在课程教学基本规范、教学内容体系、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实现了关键性变革与系统性转型，课程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1]。

课程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载体，其价值取向是统领课程改革，引领课程教学实施的根本遵循，直接决定了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模式的适配、教学评估的导向。课程绝非价值中立的、纯粹客观的知识集合。从“教什么”到“怎么教”，再到“为何而教”，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深刻的价值抉择与立场预设。在全球化、信息化与社会转型交织的复杂时代背景下，课程日益成为文化冲突、价值观念碰撞与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其价值取向问题愈发凸显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紧迫性与现实重要性。

2. 文献综述

综观国内关于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主要路径。

其一，类型学划分研究。此类研究将课程价值取向归纳为若干理想类型，以此描摹其演变轨迹。刘

志军将课程价值取向概括为“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个人本位”三种类型，认为课程改革的历史即三种价值此消彼长的过程[2]。也有学者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二元框架出发，将外语课程价值取向划分为工具主义取向与人文教育取向两大流派，梳理二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权重变化。此类研究为价值取向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工具与分类框架，但其“阶段替代”或“二元对立”模型隐含线性进步观，难以解释多重价值长期共存、此消彼长的复杂现实。

其二，政策文本与历史梳理研究。此类研究以历版教学大纲、课程指南或课程标准为分析对象，通过文本解读归纳外语课程定位的历史变迁。研究者关注政策话语中关键词的演变——从早期强调“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到后来加入“人文素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再到近年纳入“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等表述。王守仁系统梳理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从第一版到第三版的演变脉络，揭示了课程定位从“以读写为主”向“听说读写译并重”进而向“综合应用能力培养”转变的政策轨迹[1]。此类研究贴近制度文本，能够较为准确地捕捉政策层面的价值转向，但其局限在于往往停留在官方话语的归纳与描述层面，较少追问政策背后的社会压力、利益博弈与制度动因。

其三，教学论视角的实践反思研究。大量研究从教学目标设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适配、课程评价导向等维度讨论外语课程的价值实现问题，关注“如何教”和“如何评”等操作性议题，对一线教学具有直接的实践指导意义。然而，其分析视野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的内部过程，对“为什么课程会呈现出某种价值偏向”“为什么政策倡导的价值难以在课堂中有效转化”等深层问题缺乏结构性的追问与解释。课程价值取向的演变，绝非仅仅发生在课堂内部的教学论问题，而是嵌入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框架之中的系统性议题。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的共同局限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将价值演变理解为线性阶段更替，忽略了多重价值叠加共生、动态博弈的复杂特征；第二，偏重现象描述与阶段划分，缺少对演变深层机制的系统性解释；第三，社会学视角与政治学视角各自孤立运作，尚未形成能够同时解释“社会如何塑造课程”与“制度如何引导课程”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正是这一理论缺口，构成了本文引入课程社会学与课程政治学双重视角的问题意识起点。

基于现有研究的短板与学科理论发展诉求，本文基于课程社会学和课程政治学理论，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基于课程社会学理论，市场资本、高校场域、师生互动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或决定外语教育课程价值？

基于课程政治学视角，课程政策的价值协调、价值安全规约与对外战略赋能等宏观制度安排如何引导外语教育课程价值的权重配置与动态调适？

课程社会学和课程政治学如何双向互构，促进课程价值持续演变，如何实现多重价值动态平衡？

3. 研究设计

为弥补既有研究偏重理论演绎而实证支撑不足的局限，使双视域分析框架具备可检验的经验基础，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

3.1. 文本分析法

选取三份最具代表性的大学英语教学政策文件为分析对象：(1) 2004 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¹；(2) 2007 年修订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²；(3) 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大学英语

¹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0401/t20040130_110837.html

²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0707/t20070710_110825.html

教学指南》³。三份文件覆盖了我国外语教育课程改革从“要求”到“指南”的完整政策演变周期。

在操作化层面,本文将课程价值取向分为三类维度进行关键词频统计:(1)工具性价值,检索词包括“技能”“应用”“听说读写”“职场”“实用”;(2)人文性价值,检索词包括“素养”“人文”“跨文化”“思辨”;(3)思想性/引领性价值,检索词包括“文化自信”“中国故事”“价值观”“立德树人”。统计各类关键词在全文中的出现频次,计算其占三类总频次的比例,以呈现不同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权重变化。

3.2. 半结构化访谈

选取东部地区两所不同类型高校(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师范院校)作为案例学校。访谈对象包括6名大学英语教师(教龄分布为5~25年,含副教授3人、讲师3人)及10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大一至大四各年级均有覆盖)。访谈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您认为大学英语课程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课堂教学实际侧重点与政策文件要求是否一致?”“哪些因素影响了您对课程价值内容的选择或接受?”每次访谈时长约30分钟,访谈内容经录音转写后,采用主题编码法进行分析,提炼师生对课程价值的认知差异与课堂协商策略。

4. 课程社会学视域下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演变逻辑

4.1. 课程社会学的核心内涵

课程社会学(Sociology of Curriculum),早期称之为教育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认为课程不是中立、客观的知识集合,而是社会组织化的、建构的知识产物,是权力、阶层、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进行博弈而产生的结果[3]。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课程的社会学层面,或者说是具有社会学意义或特征的课程现象与课程问题[4]。从课程社会学出发审视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其理论内核是依托文化资本再生产、学科场域竞争与微观主体博弈三重透镜,逐层透视社会权力结构对课程领域的渗透与控制。

4.2. 文化资本再生产:市场筛选与课程工具价值的强化

布迪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为解释外语教育课程功利化价值的存续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以知识、技能、修养等形式存在,可通过教育资质被制度化,并在特定条件下转化为经济资本[5]。然而,文化资本的分配并非自然事实——何种知识被赋予资本属性、以何种方式进入课程,本身即是一个被选择与合法化的过程。正如阿普尔所指出的,课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法定的文化”,那些被纳入课程的“规范的”“合法的”知识,本身就是特定社会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与控制的结果,是“政治文化权力”(political-culture power)的反映[6]。课程中纳入何种语言能力、文化素材,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群体进行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知识选择暗藏阶层再生产机制。

这一依托教育完成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其深层根源在于不同阶层获取文化资本的结构化机会差异。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正是经由文凭、证书等体制化形态,文化资本才得以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持续的符号回报与合法效力[7]。学校以统一标尺衡量所有学生时,表面上奖励的是个体能力与努力,实则是在奖励优势阶层既有的文化资本积累,而将弱势阶层的不适应归因为个体天赋或努力的不足。教育系统正是以这种表面中立的考核方式,掩盖其在阶级关系结构再生产中的实质职能[8]。

在外语教育课程领域,市场化就业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再生产效应:英语四六级、考研英语等体

³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制化资本获得高额收益。文本分析显示,“工具性/应用性”词汇在三版大纲中占比均超过 40% (2004 年 47.5%, 2020 年 42.8%)。访谈中,80% 的学生表示“学英语首先为了通过考试和找工作”,多数教师承认需压缩文化拓展课时以增加应试训练。由此,政策强调的人文素养与市场筛选逻辑持续错位,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对立本质上是市场资本个体增值与课程公共育人逻辑间的结构性博弈。

4.3. 学科场域竞争: 资源博弈与课程生存价值的凸显

布迪厄的场域竞争理论为解读外语教育课程价值的结构性偏移提供了关键学理支撑。该理论认为,场域是行动者或机构之间基于资本占有差异而形成的客观关系网络,每一位置的界定取决于其在不同类型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处境与相对位次[9]。外语教育无独立一级学科建制,难以独占师资、科研、专项建设等核心学术资源,在以科研产出为核心的高校评价体系中,天然缺少参与学术资本竞争的制度条件,长期居于学科场域边缘。

这一结构性弱势的深层根源,在于外语教育的课程属性而非学科属性。学科的存在与社会需求无涉,而课程则必然随社会需求与学习者水平的变化而调整。进入 21 世纪以来,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使得传统通用语言训练为主的教学定位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课堂吸引力下降与课程课时压缩成为普遍现象。当外部需求发生转向时,课程若欲维系其在教育场域中的生存价值,便只能调整自身内涵定位以对接新的需求增长点。分析发现,2007 年大纲较 2004 年新增“职场应用”“学术英语”等表述,频次显著增加,这折射出课程价值在外源性社会需求驱动下的结构性偏移。

4.4. 微观主体博弈: 师生互动与课程价值预设的协商重构

课程的社会性不仅表现于“宏观层面”,即课程与社会系统中其它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也涉及“微观层面”,即课程成为联结教师与学生两种不同社会角色的一种媒介[10]。阿普尔的批判课程理论恰好为切入这一微观层面的价值生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阿普尔将课程视为“法定知识”(legitimate knowledge),这一概念本身即暗示着:进入学校课程的知识并非价值中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特定社会群体凭借其文化权力将自身知识合法化的结果[11]。然而,阿普尔进一步指出,学校教育并非某种单一价值体系得以单向强加的工具,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也必须将自身的议程与反对群体的声音相结合,方能维持教育过程的动态平衡[12]。据此逻辑推演至外语教育课堂:官方课程政策与教材所承载的价值预设,在进入课堂场域后必然遭遇师生的选择性理解、策略性应对乃至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课堂并非标准化政策的被动执行场,而是多元主体围绕“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以何种方式传授与接受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持续协商与博弈的微观场域。

依托上述理论透镜解析外语教育课堂价值取向的微观生成机理:教师主体的学术背景与教学理念构成其个性化教学逻辑,使统一的课程政策衍生出多元课堂价值形态;中学生群体则因升学导向、个人兴趣或发展愿景等差异化诉求,持续提出超越标准框架的价值期待,倒逼出交际应用导向、文化思辨意识及自主终身学习能力等新型个体化诉求。教师的策略性调适与学生的多元诉求双向碰撞,构成课堂持续的价值互动博弈,有效揭示了“顶层标准统一、课堂实践多元”格局的形成逻辑,完善了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动的分析链条。

5. 课程政治学视域下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演化逻辑

如果说课程社会学揭示了市场、场域与课堂等社会力量对课程价值“自下而上”的塑造,那么课程政治学则着眼于国家权力与制度安排对课程价值“自上而下”的引导与调适。本章在界定课程政治学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从课程政策协调、价值安全规约与国家战略赋能三个维度,逐层阐释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在制度框架内的演变逻辑。

5.1. 课程政治学的核心内涵

课程并不是价值无涉、政治中立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属性[13]。课程在目标确立、内容选择、组织传递乃至评价管理等运行环节中,始终受到特定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与权力关系的渗透与制约[14]。课程政治学的核心判断是:课程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载体,同时也是价值引导的制度化工具——国家通过课程标准、教材编审、评价体系等制度性安排,将特定的价值取向嵌入课程之中,以此引导人才培养的方向与社会秩序的维系。

5.2. 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理论:课程多重价值的制度化协调

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理论为审视外语教育课程价值的动态调适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课程政策是政府等政治实体出台的与课程领域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其实质是课程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在课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涉及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政府与学校之间等多重关系的处理,指导决策主体合理地处理和调整这些基本关系的价值标准,便构成了课程政策的价值基础。课程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学校应该教什么”——这一问题本身即是一个价值问题,任何国家的课程政策都必然涉及对知识总体的筛选与加工,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将这一逻辑引入外语教育领域,国家通过课程标准制定、教学指南修订、评价体系调整等课程政策工具,对课程的多元价值权重实施持续性的制度化协调。

这种制度化协调的实质在于:课程政策体系通过弹性化的制度框架,为多重价值的共存划定基本格局。具体而言,当国际交流与合作需求提升时,课程政策侧重工具价值维度——强化语言技能训练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权重配置;当国内文化自信建设需求凸显时,课程政策则强化本土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维度——课程思政内容与中华文化叙事在教学指南中占据更为显著的位置。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权重配置各有侧重,但被削弱的价值并不会因此退出课程体系,而是转入相对低位状态,等待新的制度条件激活。

5.3. 价值安全规约:跨文化课程价值边界的制度化引导

课程是一种承载特定价值观念体系的合法性知识载体[13],而非纯粹客观的知识集合。知识的选择、组织与传递过程本身即是一种价值筛选与确认的过程。在跨文化教育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外语课程因其知识来源的跨文化性与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天然承载着异质文化叙事与多元价值话语。这种多重性并非外语课程的缺陷,而是其学科属性所内生的特征。然而,多元价值的并存并不意味着价值边界的消失——教育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化过程,必然需要对课程所承载的价值内容进行必要的筛选与引导,以确保人才培养方向与国家发展需求之间的基本一致性。因此,国家需要通过教材编审、教学内容审核与课堂教学监管等制度化安排,对课程中本土文化叙事与异质文化内容的比例与权重实施持续性调适,以平衡跨文化开放交流与本土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

在外语教育课程实践中,这种制度化引导体现为历版教学指南在“国际视野培育”与“本土文化认同”之间持续寻求双重目标的并行与动态平衡。一方面,课程保留全球多元文明、国际公共议题、跨文化交际等内容维度,保障课程的开放价值;另一方面,持续扩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发展成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叙事内容,强化本土文化身份建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引导并非以外在于课程的方式强加,而是内化于课程标准的价值表述、教材编写的基本导向与教学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之中,以制度化的方式维持课程价值的底线共识。

5.4. 国家战略赋能:外语教育课程价值的增量式扩容

国家战略需求是驱动外语教育课程价值持续拓展的外部动力。外语教育作为覆盖面最广的公共基础

课程，其功能定位始终与国家对外开放与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紧密关联。每一次国家重大战略的出台，都会对外语教育课程提出新型能力诉求，而原有课程价值诉求并不因新战略的介入而消失，新旧价值之间更多呈现为叠加共存而非替代更替的关系。

对外开放战略赋予课程涉外沟通与通用英语人才培养的价值，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则新增了中国故事对外讲述、跨文化舆论沟通、中华文化外译等新型价值。多重战略价值持续嵌入原有课程体系，与基础语言工具价值、人文素养价值及价值引领规范等形成多层并存的格局。课程价值的演化由此呈现出“增量叠加、多层嵌套”的特征——不同历史阶段嵌入的战略价值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该分析证明了课程价值演化不是“旧价值消亡、新价值产生”的阶段更替，而是“旧价值存续、新价值叠加”的持续扩容。战略赋能与课程实践的融合分析，完整揭示了课程价值体系愈发多元、愈发立体的演化规律，弥补了传统研究阶段化、片面化的分析缺陷。

6. 双重视域的双向互构：整合机制与动态平衡

前文分别从课程社会学与课程政治学两个维度，解析了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博弈”与“自上而下的制度调控”双重量作用下的演变逻辑。然而，两重视域并非各自独立运作的解释系统——课程价值的实际走向是二者持续互构、实时校准的产物。本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两重视域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

6.1. 两重视域的分析侧重与互补逻辑

课程社会学与课程政治学的分析各有侧重，彼此互补。课程社会学回答的是“社会如何塑造课程”，课程政治学回答的是“制度如何引导课程”。单一视域只能看到课程价值演变的一半逻辑。社会学视域长于解释社会力量的塑造效应，却容易低估制度框架的刚性约束；政治学视域长于分析制度调控的效力，却可能忽视社会需求对政策执行的消解与转化。唯有将两重视域整合并置，才能呈现课程价值演变的全景图。

6.2. 双向互构的运行机制：社会诉求向上传导与制度调控向下渗透

两重视域之间的互构关系通过两条现实路径得以具体化。

其一，社会诉求向上传导，推动制度调控的回应性调整。市场筛选对工具价值的强化并非仅在课堂层面产生影响，而是通过毕业生就业质量数据、用人单位需求调查、社会舆论等渠道向上传导至制度决策层，影响课程标准中工具价值的权重配置。同样，师生在课堂层面对课程价值的协商与重构，也通过教学评估、课程反馈等制度性渠道进入政策议程。

其二，制度调控向下渗透，引导社会场域的价值预期与资源配置。国家战略对课程价值的赋能通过经费分配、项目设立、评估指标等制度工具向下渗透，反向塑造学科场域的竞争格局与师生对课程价值的认知。制度性引导虽不能直接决定师生的价值选择，却能够通过改变资源分布与竞争规则，间接塑造社会层面对课程价值的预期。

双向互构的核心在于：社会的诉求通过制度性渠道被吸纳、转化为政策导向，制度安排又通过资源分配与规则设定反向塑造社会预期。二者在相互感应中持续校准，使课程价值体系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7. 结论

本文构建的“课程社会学与课程政治学”双重视域分析框架，为理解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的演变机制提供了整合性解释路径。研究证实，外语教育课程价值取向并非线性阶段更替，其持续演化的本质

是社会结构博弈与制度调控双向互构、多重价值叠加共生的动态过程。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了传统“类型学转换”的解释范式,揭示了“旧价值存续、新价值叠加”的增量式扩容特征;在实践层面,研究表明课程改革应立足双理论融合视角,在制度规约与社会调适之间构建弹性多元、动态平衡的课程价值体系,以实现国家战略、社会需求与个体发展之间的有效协调。

参考文献

- [1] 王守仁. 全面、准确贯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J]. 中国外语, 2010, 7(2): 4-7+20.
- [2] 刘志军. 课程价值取向的时代走向[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4, 24(10): 46-49.
- [3] Young, M.F.D. (1971)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urricula as Socially Organized Knowledge*. In: Young, M.F.D.,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ollier-Macmillan Publishers, 119-146.
- [4] 吴康宁. 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J]. 上海教育科研, 2002(9): 4-7.
- [5] 包亚明.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90.
- [6] Apple, M.W. (1979)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Taylor & Francis.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241219>
- [7]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Richardson, J.G.,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Greenwood Press, 241-258.
- [8] 李全生.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03(1): 8-12.
- [9] 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34.
- [10] 吴康宁, 郝京华, 吴永军, 等. 课程的社会学研究简论[J]. 教育研究, 1997(9): 26-30+ 49.
- [11] Apple, M.W. (1990)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2nd Edition, Routledge, 34.
- [12] Apple, M.W. (1995) *Education and Power*. 2nd Edition, Routledge, 138.
- [13] 郝德永. 论课程文化政治学的重构——基于课程政治安全的视角[J]. 现代教育管理, 2023(8): 40-49.
- [14] 郝明君. 知识与权力: 课程作为政治文本之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06.